

## · 读书札丛 ·

## 左纛位置的文献考索

刘 瑞

左纛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黄屋左纛”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历来的文献中相关记载很多，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最早记载分别是蔡邕的《独断》和司马彪的《续汉书·舆服志》。在《续汉书·舆服志》和今本蔡邕《独断》中，“左纛”位于天子乘舆的左骖马头上，各种记载之间相当一致，所以长期以来从未有人提出过任何异议。但到了1983年，当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了秦代以二分之一比例制造的仿真殉葬铜车马后，这个问题才几乎是第一次被提出，即到底“左纛”应该是位于左边还是右边。因为在秦铜车马的最右一匹骖马的头上树立着左纛<sup>①</sup>，与文献记载正好相反。人们被迫开始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最后孙机先生提出：树立于右骖马头上的纛之所以被名为左纛，“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战车一般向左转弯，即《郑风·清人》所谓‘左旋’的缘故。”“由此而产生的左纛之制，亦不应理解为左侧之纛。”<sup>②</sup>这个解释除了运用丰富的知识解决了为什么名为左纛却立于右骖马头上的原因外，并没有多少古代直接关于此项制度的相关文献的支持。那是不是就真的没有记载左纛是位于右骖马头上的文献呢？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最近，我们在原本《玉篇》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对于上述现象可以给予恰当解释的文

献证据，所以想试作一分析并提供出来供大家研究，不足的地方敬请方家指教。

《玉篇》是南朝陈吴郡人顾野王在梁大同九年（543）所撰成的一部字书，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所可以见到的本子却并非是顾氏原本，实际上它是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等所作的重修之本，叫《大广韵会玉篇》，已经与原本相差很大。清光绪初年，黎庶昌出使日本，在东京竟然意外的发现了若干古本《玉篇》的残卷（后来又陆续有少量发现）。据黎庶昌、杨守敬、李慈铭等前辈学者考证，认为它是顾氏原本的残卷，“即使不是顾氏之旧，也是唐人的抄本，比较接近顾氏原本。”<sup>③</sup>弥足珍贵。就在这原本《玉篇》中我们发现它引用了蔡邕的《独断》，而这一条引用的文献又恰与“左纛”的位置有关。原本《玉篇》“系部第四百廿六”共有五字，其中在“纛”字的解释下引用了《独断》：

“蔡邕《独断》：乘輿與车黄屋、左纛。纛者，以牦牛尾为之，大如斗，在最右駢马头上也。”<sup>④</sup>

蔡邕即蔡邕，古书中二者经常混用。与过去的记载相异，《续汉书·舆服志》本文讲“左纛以牦牛尾为之，在駢马轭上，大如斗，是为德车。”<sup>⑤</sup>刘昭为这句话作注时引用了蔡邕的观点：“蔡邕曰：‘在最后左駢马头上’”<sup>⑥</sup>，比《续汉书》的本文关于左纛方位的解释略微详细（但一为在马轭上，一为在马头上）。

《续汉书》注的作者刘昭为南朝梁人，在天监（502—520）中开始作官<sup>⑦</sup>，注志当在此时或此后。也就是说，与顾野王写《玉篇》的时间是几乎相同的，但是它所讲的“左纛”制度却与《玉篇》原本完全相反，一个记为左而另一个却记为右，那到底应以哪一种文献为准呢？毫无疑问，从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发现看《玉篇》所引用的《独断》的记载与出土文物完全一致，不仅左纛位于右駢马的位置一致，就是位于马头的记载也与出土物相同。可以肯定，我们现在看到的刘昭所引用的蔡邕原文有误而原本《玉

篇》引用的《独断》正确。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原本《玉篇》所引《独断》关于“左纛”的解释是目前惟一一条关于左纛的可以与文物相互印证的文献。这样我们就还可以解决一个关于《独断》文字至迟出现错误的问题，即我们在确认了这一条《独断》就是蔡邕的原文后，我们也就知道了在刘昭为《续汉书》作注时见到的原本《独断》已经发生了错误。由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玉篇》的成书时间与刘昭注《续汉书》的时间几乎相同，那现在所存在的二者于同一事物记载相异的情况，就应该能够反映出在当时《独断》得到频繁使用的大背景下，它的不同抄本之间实际上已经是错误不少了。

注：

①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5页。

②孙机：《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原载于《文物》1991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③姜聿华：《中国传统语言学要籍述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242页。

④《原本玉篇残卷》，中华书局，1985年，188页。

⑤《续汉书·舆服志》，3644页。

⑥《续汉书·舆服志》，3645页。

⑦《梁书·文学列传》，692页。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